

闽国士人的政治命运

祁开龙

(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, 福建 福州 350007)

[摘要] 唐末五代初, 中原地区战乱不断, 士人的生存状况急剧恶化。而同时的福建在王氏治理下, 相对安定, 许多士人为避祸, 纷纷南下福建。在闽国前期, 王潮、王审知兄弟礼贤下士, 得到士人支持, 使闽政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与发展; 闽国后期, 王氏诸主昏聩残暴, 信任巫道, 蔑视和迫害士人, 政治迅速腐败, 闽国走向衰亡。

[关键词] 闽国; 士人; 政治命运

中图分类号: G122 文献标识码: A 文章编号: 1008-8563(2010)02-0038-05

五代十国是个国危、世乱、民苦的时代, 其惨烈程度在历史上是罕见的。欧阳修在《新五代史》的叙事议论中常用“呜呼”两字开头, 可见后人对那个时代的失望程度。过去学界对五代十国这段历史的关注点主要在中原政权, 对南方的小政权较少关注, 仅有少数文章对闽国灭亡较早的原因及其政治发展进行探讨。如张晓东的《闽国的宗教、方术对政治的影响》一文论及闽国灭亡较早的原因与宗教、方术有很大的关联, 而专著在涉及五代部分时, 往往浅尝辄止。笔者认为还有深入探索的必要, 本文拟从士人政治命运的变化, 探讨士人与闽国兴衰的关系, 进而寻找闽政权早亡之所在。

一、相对稳定的闽国政局

五代时期, 中原地区战乱不断, 政权更迭频繁, “置君犹易吏, 变国若传舍”, 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, 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”^[1],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军阀混战的动乱时期。每一次改朝换代, 都必然伴随着一场血雨腥风, 加之这一时期军阀混战, 致使武夫势力坐大, 武夫悍将成为社会的主宰。他们迷信武力, 认为“安朝廷, 定祸乱, 直须长枪大戟, 至如毛锥子, 焉足用哉!”^[2]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, 上至皇帝, 下至地

方藩帅, 都肆意凌蔑、杀戮文士。其中最出名的是朱全忠, 在他任宣武节度使时, 就制造了“白马之祸”。《通鉴》卷二六五载:

柳恃朱全忠之势, 恣为威福。会有星变, ……因疏其素所不快者于全忠曰: “朝廷所以不理, 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纲纪; 且王欲图大事, 此曹皆朝廷之难制者也, 不若尽去之。”全忠以为然。……自馮或胄高华, 或科第自进, 居三省台阁, 以名检自处, 声迹稍著者, 皆指以为浮薄, 贬逐无虚日, 搢绅为之一空。

六月, 戊子朔, 裴枢、独孤损、崔远、陆扈、王溥、赵崇、王赞等并所在自尽。

时全忠聚枢等及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, 一夕尽杀之, 投尸于河。^[3]

北方君主只重武力, 对文士普遍不太重视。后汉高祖也曾直言: “朝廷大事不可谋及书生, 懦怯误人。”^[4] 皇帝尚且如此, 地方节度藩镇杀幕僚, 排辱宾客举不胜举。后唐宁江节度使西方邺“所为多不中法度”, 判官谭善达屡次劝谏, “邺怒, 遣人告善达受人金, 下狱”。善达刚毅, 最后死于狱中。^[5] 后晋平卢节度使房知温, “性粗犷, 动罕由礼”, “多纵左右, 排辱宾客”。^[6] 后汉的情况更加糟糕, 刘知远的顾命大臣杨邠常说:

收稿日期: 2010-03-24

作者简介: 祁开龙, 男, 福建荔城人,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。

“为国家者但得帑藏丰盈，甲兵强盛，至于文章礼乐，并是虚事，何足介哉！”^[7] 他的同僚主管财政的三司使王章，十分歧视文臣，他说：“此等之人若给一把算盘，连倒顺都不知道，养他们何益于事！”基于这种轻蔑文士的态度，对文臣的月俸则百般苛扣。每月发给月俸，“皆取不堪资军者给之，谓之‘闲杂物’，命有司高估其价，估定更添，谓之‘抬估’”。^[8]

士人境遇的严重恶化，致使他们与中原政权逐渐疏离。他们为了逃避祸乱，往往南迁至相对稳定的南方，闽国是当时士人南迁的目的地之一。福建的地形是三面环山，一面向海，向来是易守难攻之地，故较少受战乱波及，较为安定。另外，王潮、王审知兄弟据闽时，江西尚未归吴，钱镠与杨行密正集中精力在太湖地区争夺，无力南下。而王氏兄弟又恪守“交好邻道，保境息民”的政策，^[9] 不轻启战端。故闽赣与闽浙边境基本相安无事。闽粤也只在边境上打过一仗。后梁建立后，闽同南汉、吴越一样，奉梁为正朔。同为藩臣，南汉、吴越也不敢轻易伐闽。借着“尊王”的大旗，闽获得了较长时间的稳定。

二、闽国的士人

古语有云：“马上得天下，焉能马上治之”，“夫争天下者，必先得人”，得士者得天下的道理，是明主所深谙的道理。王潮、王审知时期对人才十分重视，能礼贤下士，多方延揽人才，故“唐衣冠卿士跋涉来奔，若李洵、韩偓、王标、夏侯淑、王淡、杨承休、王滌、崔道融、王拯、杨赞图、王侗、杨沂丰、归传懿诸人，未易屈指”。^[10]

王氏兄弟招揽士人，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：

（一）安抚流寓。韩偓，京兆人，昭宗反正，励精政事，“偓处机密，率与意合，欲相之，屡让不受。”韩偓的重用，引起了朱全忠的猜忌，先被贬为濮州司马，又再贬为荣经尉，徙邓州司马。昭宗被杀，哀帝复召为学士。但“偓不敢入朝，挈族来依太祖，侨居南安。”^[11] 崔道融，荆州人，以征辟为永嘉令，累官右补阙，“避地来闽依太祖，未几，病卒。”^[12] 杨沂丰，唐宰相杨涉从弟，“遭乱，依太祖，与徐寅、王淡同居幕府，以风雅倡和，闽士多宗之。”^[13] 另外，出仕于北方的闽籍士人，为了躲避祸乱，也纷纷回归故土。徐寅，莆田人，常游大梁，以赋谒梁王，误触朱全忠忌讳之处，想潜逃回故里，又怕不能成功出逃，做大梁赋以献，朱全忠得赋大喜，赏缗五百疋。“已而走归家里，太祖辟为掌书记。”^[14] 仕途的不

如意，也是闽籍士人回归故里的原因之一。潘承佑，晋安人，初仕吴，任光州司法参军。“因争郡大狱不得，弃官归闽，仕至大理少卿”。^[15]

（二）起用本地德才兼备之士。王氏兄弟作为外地人入主福建，若想在福建建立稳定的政权，需要本地士人的支持。章仔钧，“浦城人，深沉有大度，年逾四十，隐居不仕。乾宁时，太祖代司空镇闽，奉表修贡。仔钧以太祖尚知有唐，乃诣军门上谒，投战攻守三策。……太祖大喜，馆为上宾。”^[16] 仙游人郑良士，在唐朝时官至御史中丞，后归隐故乡，经官府多次恳请，“始赴闽王审知辟命，初署馆驿巡官，寻辟建州判官。公性沉厚寡言，审知以其长者，迁威武军节度掌书记，寻转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”。还有许多士人被辟任地方官员，如侯官人贾郁，“以文策於太祖，补仙游主簿，秩满为令。”浦城人杨澄，“博通文史，为乡党所称”。王审知对其十分欣赏，“即日解褐，置之幕府。未几，赐五品服，拜本县令”。^[17]

南下士人和本地士人的大量启用，为闽政权的建立及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。作为一个国家政权需要一套完整的礼仪法度，而这些是那些武夫悍将所不懂的；长期战乱对于经济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，发展生产是稳定统治的一个先决条件。而所举这些都需士人来主导，他们在政权的建立及其延续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

当然，我们也不必讳言，当时一些士人并不认同割据藩镇，拒绝闽政权的征辟。如王仁绩，福唐人，“太祖闻其贤，命试大理评事，仁绩耻事强藩，顾辞，隐居龙山，终其身。”^[18] 黄岳，福州感德场人，“太祖为威武节度使，闻其名，累辟为属，力辞不就”，“太祖受王封，必欲起岳，岳多不能拒，遂投渊而死。”^[19]

三、闽国士人的政治命运

（一）士人与闽国前期政治

王潮、王审知治闽期间，福建地区政治安定，较少战乱。王潮任福建观察使时，“遣僚佐巡州县，劝农桑，定租税，交好邻道，保境息民，闽人安之。”^[20] 王审知继王潮后，继续奉行潮之既定政策，节俭生活，史称：“审知起自陇亩，以至富贵，每以节俭自处，选任良吏，省刑惜费，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，三十年间，一境晏然。”^[21] 王氏兄弟治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，除了自身的才华外，得到士人的竭诚效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。

经济上，唐末农民起义席卷全国，福建也出现了农民起义，加之各割据势力，攻城掠地，大

肆杀掠，造成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凋敝。发展和恢复经济是当时稳定统治的关键所在。福建是个传统的对外贸易区，自王审知始，积极开展海外贸易，商业得到逐步发展。“（王审知）招徕海中蛮夷商贾，海上黄歧，波涛为阻，一夕风雨，雷电震击，开以为港，闽人以为审知德政所致，号为甘棠港。”^[22] 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，反映了劳动人民开辟甘棠港的事实，同时可见发展海外贸易是顺应人民要求的。张睦在福州主管商业，“抢攘之际，雍容上下，招来蛮商贾，敛不加暴，而国用日以富饶”；^[23] 王延彬，在泉主政前后二十六年，“每发蛮舶，无失坠者，人因谓之招宝郎。”^[24] 闽国时期，福建沿海得到了很大的开发，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。到宋元明清时期，福州、泉州逐渐发展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重要港口之一。

文化教育上，五代为季世，文化教育遭到极大破坏，欧阳修在《新五代史·一行传》序中说：“五代之乱极矣。……干戈兴，学校废，而礼义衰，风俗坠坏。”^[25] 中原经常混战，局势动荡，诸朝不提倡文化教育，又欺凌士人。而在福建，由于社会相对稳定，许多士人的入闽，福建的文化教育得到了很大发展，培养了一批人才。王审知接受福唐人翁承赞的建议拓建四门学，“承赞劝太祖建四门学，以教闽士之秀者。”^[26] 地方官吏致力于兴学的则有陈洪济，“（洪济）初令同安，继令晋江，皆兴学教士，为王氏循吏之冠。”^[27] 可以说，宋元明清时期福建人才辈出，是与闽国的开风气之先息息相关的。

在外交上，士人充当使节，周旋于中原及南方各大政权之间。五代割据政权林立，各政权间的兼并战争不断。闽与当时南汉和吴相毗邻，能否妥善的处理好与这两国的关系，对于闽国自身的发展非常重要。在士人的协助下，闽大力推行睦邻政策，与中原、邻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。后梁时，各割据藩镇纷纷僭位称帝，而占据福建的王审知，始终奉中原为正朔。一些有政治远见的士人也反对王审知称帝，王延嗣，“太祖族子也。为人慨切好直言，以道义自任，当时目为‘唐五经’。……是时强藩巨镇多僭号称帝，太祖不无动心，延嗣反复极谏，力言不可。太祖虽不乐其言，然终身不失臣节，延嗣亦有功云。”^[28] 节度推官黄滔也劝导太祖勿称帝，“太祖据有全闽，而终其身为节将者，滔归正有力焉。”^[29] 福建地狭力弱，根本无力兼并其他割据政权，打着“尊王”

旗号以图自保是当时最好的策略。除了获得中央政权的支持外，与其他邻国建立良好外交关系，取得他们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。闽与吴越有共同的敌人吴，两国的关系也最为密切。901年（天复元年），钱镠之母去世，王审知派使者去吊唁，唁文是黄滔所写，文中写到“审知幸攀令嗣，获忝亲邻，论交既契于金兰，抹泣乃同于亲属。辄陈薄奠，用表悲诚，敢冀明灵，依稀歆鉴。”^[30] 这一系列外交活动，都是由士人直接出任的。他们出使各国过程中，一方面展示了闽国的国威；另一方面，出使各国，也充分了解了各国的形势，对于闽适当调整措施，行事宜之计有重要帮助。

（二）巫道弄权与士人地位的变化

王审知死后，闽政权就陷入了兄弟为争权而内斗的动乱之中。王延翰继王审知之后而立，他骄淫奢侈，又猜忌兄弟，把他们排挤在外。其弟王延钧被贬为泉州刺史，与建州王延禀合谋出兵。王延禀从建州出兵，攻入福州杀死延翰，拥立延钧。

王延钧“其初数年，颇亦善守”，^[31] 但后来就越来越昏聩残暴。他崇信佛、道，宠信道士陈守元和巫师徐彦、盛韬等人，听信他们的谰言，修建宝皇宫。福州有王霸坛、炼丹井。坛旁有一棵干枯已久的皂荚树，一天这棵树忽然开出新的枝叶；不久，又在炼丹井发现了一只白龟，并掘得一块刻有“王霸裔孙”的石碑。按照陈守元等人的说法，这是王延钧要当皇帝的预兆。王延钧听了很高兴，在王霸坛旁修建了宝皇宫，宝皇宫的规模极大，时人称为“极土木之盛”。宝皇宫修成后，以陈守元为宫主。^[32]

除了取得地位的尊崇外，巫道们还利用王延钧的极度迷信，搬弄朝政，陷害大臣。闽国地狭人少，王延钧又极其奢华，国用不足。于是，他用薛文杰为国计使，“文杰多查民间阴事，致富人以罪，而籍没其资以佐用，闽人皆怨。”薛文杰广事搜刮，虽引起了上下的不满，但他有巫道徐彦、盛韬等人的支持，地位仍然很巩固（徐彦为薛文杰所荐）。薛文杰和内枢密使吴英有隙，就和巫道联合陷害。吴英患病告假，薛文杰假意看望，并欺骗说：“主上一公久疾，欲罢公近密，仆言公但小苦头痛耳，将愈矣。主上或指使来问，慎勿以它疾对也。”吴英不知有诈，一口答应。薛文杰又指使徐彦报告王麟说：“入北朝，见英为崇顺王所讯，曰：‘汝何敢谋反？’以金槌击其头。”王麟以此语问薛文杰，文杰还故意为其辩护说：“未可信也，宜遣使问之。”吴英果称头痛。于是，

王鏐立即下诏将其逮捕，屈打成招，吴英最终被杀。^[33]

薛文杰与巫道们的所作所为，引起了闽中士人的忿怒，兵士们更是愤愤不平。吴英之子吴光出逃至吴，请兵为父报仇。吴信州刺史蒋廷徽急于邀功，很快出兵攻打闽国。在吴光的引导下，他们很快攻下浦城。消息传来，王延钧一面向吴越乞援，一面派兵抵抗。闽士卒走到半路，强烈要求杀掉薛文杰，否则拒绝出战。王延钧无奈，让其子王继鹏押送至军中。起初，文杰嫌旧囚车太宽松，设计新囚车，“形如木匱，中以铁钐内向，动辄触之，既成，首被其毒”。文杰一到军中，就被将士斩杀于市中。^[34]

王继鹏的短暂统治。935年（后唐清泰二年）王继鹏与皇城使李倣发动政变，弑父继位。王继鹏的骄奢淫逸，残忍贪婪，愚蠢无知更甚于乃父，时人林省邹谓其：“不事其君，不爱其亲，不敬其神，不睦其邻，不礼其宾”。^[35]其实王继鹏对神鬼之说是非常信奉的，与其父相比有过之无不及。

方士告诉王继鹏，在螺峰有白龙出现（龙为帝王出现之兆），继鹏就在此修建白龙寺。但当时百役繁兴，国用不足，他便问吏部尚书判三司蔡守蒙：“闻有司除官皆受贿，有诸？”蔡守蒙矢口否认。王继鹏却公开说：“朕知之久矣。今以委卿，择贤而授，不肖及罔冒者勿拒，第令纳贿，籍而献之。”守蒙素来清廉，以为此法不可。王继鹏大怒，守蒙只得从之。从此，任官便以纳钱财多少授之。同时，他又以“空名堂牒使医工陈究卖官於外，专务聚敛”。^[36]

他继位后就贬斥师傅叶翹，拜道士谭紫霄为正一先生，陈守元为天师，巫师林兴也以巫术得到宠信。不论大小事情，都与巫道们商议，巫道们也就假借宝皇之命，胡作非为。陈守元利用王继鹏为求长命百岁的心理，教其“起三清台三层，以黄金数千金铸宝皇及元始天尊、太上老君像，日焚龙脑、熏陆诸香数斤，作乐于台下，昼夜声不辍，云如此可求大还丹”。此外，政事裁决，官吏任免，刑罚选举，王继鹏“皆传宝皇命决之”。陈守元乘此机会，广收贿赂，“受贿请托，言无不从，其门若市”。巫道林兴与前建州刺史延武有怨，他借王继鹏对王延武和户部尚书王延望的猜忌心理，诡传神言：“延武、延望将为变。”王继鹏深信不疑，命林兴率壮士杀掉王审知之子王延武、王延望和他们的五个儿子。^[37]

巫道干政，是政治黑暗的重要表现。当时许

多敢于直谏的臣子被贬、被杀，谏议大夫黄讽见康宗淫暴，与妻子诀别入谏，康宗王继鹏听了很生气，欲杖之，讽不受杖，对曰：“臣若迷国不忠，死亦无怨。直谏被杖，死不受也。”最后，黄讽被罢黜回家。为了在乱世中保存自己，士人们纷纷归隐以求保全。康宗的师傅叶翹为人博学刚直，见朝政日非又无力扭转，请求辞官回归故里，王继鹏虽有挽留，但终不见用，放归永泰。^[38]晋使卢损入闽，康宗遣凤阁舍人刘乙招待。不久，刘乙就弃官归隐凤山。固始人詹敦仁，避乱隐于仙游。上康宗书，数百言，康宗欲命之参决军事，敦仁以诗谢之。“（康宗）强以袍笏，不受，已复杜门不出。”^[39]

（三）闽国后期的内战

939年，拱宸控鹤都将朱文进、连重遇发动兵变，攻杀王继鹏，拥立王延羲为帝。王延羲对王氏宗族十分猜忌，害怕宗族里有人会取代自己。对于实力强悍的建州刺史王延政，他最为忌恨。他首先挑起了对建州的战争，王延政自度不敌，乞师于吴越。吴越兵未至，延政就打败福州兵，并乘胜攻取永平、顺昌。吴越兵至建州，延政以战争已获胜，请班师。吴越意图兼并，不肯还师。延政害怕，又与延羲联手击走吴越军。吴越败走以后，王氏兄弟，又开始互相攻伐，互有胜负，以致“福、建之间，暴骨如莽”。^[40]在这场内耗中，闽政权逐渐走向瓦解。

延羲十分嗜酒，“在位为长夜之饮，锻银叶为酒杯，以饮群下，银叶既柔弱，因目之为‘冬瓜片’，又名之曰‘醉如泥’。酒既盈，即不复置他所，惟饮尽乃可得舍。”^[41]他常在酒后查人过错，宗室、大臣被杀者不少。一次，他的侄子王继柔因不胜酒力，偷偷将酒倒掉一些，王延羲命人将其立即推出斩首。又如，翰林学士周维岳很能饮酒，群臣都喝得烂醉，周维岳仍然是面不改色。延羲觉得很怪，便问：“维岳身甚小，何饮酒之多？”旁边侍候的人解释说：“酒有别肠，不必长大。”酒醉中的延羲就想对周维岳开肠破肚，以观酒肠。左右之人忙劝之曰：“杀维岳，无人侍陛下剧饮。”^[42]周维岳因此逃过一劫。

对于王延羲的桀纣之行，许多耿直之臣纷纷上谏。谏议大夫黄峻抬棺进宫直谏，延羲骂道：“老物狂发矣！”贬漳州司户。校书郎陈光逸见国事日非，对其友说：“主上失德，亡无日矣；吾欲死谏。”其友劝之，不从，上书直谏延羲五十恶事，延羲大怒，命卫士鞭打数百。见光逸未死，

又叫人用绳索系于脖子上，挂在庭院的树上，直至其断气。^[43] 其实对于延羲的残暴，臣子们都有清醒的认识。但内在的责任感，还是使他们敢于触逆鳞。

士人在闽国后期遭到排斥，原因有以下几个：

第一，统治者追求奢侈的生活方式，与士人积极进取的志向相冲突。闽国早期的统治者王潮、王审知严于律己，励精图治，福建在他们治下是当时最安定的地方。王审知之后，继位的诸主，穷奢极欲，贪婪残暴。王延钧一次奉母回乡，“田铺缙锦，木被才缙，因名里曰锦里，驿曰锦田”。^[44] 王继鹏喜欢好马，“诏以金钱市马，得良马五，赐号曰金鞍使者、千里将军、致远侯、渥洼郎、驥国公”。^[45] 王延羲喜饮酒，常常举行大规模的夜宴，通宵达旦。闽后期的统治者还喜欢大建宫殿，梁克家在《三山志》里记录到：“伪闽僭号，改作逾制，通文、永隆之间，宫有宝皇、大明、长春、紫薇、东华、跃龙，殿有文明、文德、九龙、大黼、明威，门有紫宸、启圣、应天、东清、安泰、金德……”^[46]

第二、王审知后诸主，素质低劣，无治国安邦之才，又无开疆拓土之志。其中惠宗王延钧是与王延禀相勾结，杀兄夺位的；康宗王继鹏是弑父继位的；而王继鹏自己则在兵变中被杀，王延羲继立。他们在位期间，都任性妄为，奢侈无度，或刚愎自用，任用小人，或迷信神鬼，委政于亲近的巫道。尤其是王延羲当政期间，发动了福州与建州的持久内战，闽国在这场内耗中走向灭亡。

中国士人自古就信奉着这样的信条：君有道则现，君无道则隐。自王审知之后，士人们有的因耿直直谏被杀；有的因受到歧视和排挤，愤然归隐故里；有的见风使舵，尸位素餐；有的则出走其他政权，为他们服务。总之，在闽国内部，由于统治者醉生梦死，由于巫道弄权，由于兄弟争权，内战不休，导致政治日益腐败，经济萎缩，军事废弛，国力遭到严重削弱。闽国的衰败，最终导致外敌的入侵。后晋开运二年，南唐中主李璟一反“保境息民”成策，趁闽中大乱，出兵进取建州，“建人苦于王氏之乱与杨思恭之重敛，争伐木开道以迎之。”南唐军队势如破竹，轻易的推翻闽国黑暗的统治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欧阳修. 新五代史·序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. 1.
- [2] 薛居正. 旧五代史：卷一百七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6. 1406.
- [3] 司马光. 资治通鉴：卷二六五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6. 8645-8643.
- [4] 司马光. 资治通鉴：卷二八九[M]. 中华书局. 1956. 9431.
- [5]、[6] 薛居正. 旧五代史：卷六一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6. 824、1196.
- [7]、[8] 薛居正. 旧五代史：卷九一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6. 1408、1410.
- [9]、[20] 司马光. 资治通鉴：卷二五九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6. 8460、8460.
- [10]、[11]、[12]、[13]、[14]、[16]、[22]、[23]、[24]、[26]、[29] 吴任臣. 十国春秋：卷九十五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. 1372、1371、1372、1372、1374、1379、1378、1378、1363、1376、1373.
- [15]、[27]、[35]、[38] 吴任臣. 十国春秋：卷九十六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. 1386、1390、1383、1383-1384.
- [17] 杨亿. 武夷新集：卷十一[M]. 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7. 18.
- [18]、[19]、[39] 吴任臣. 十国春秋：卷九十七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. 1391、1392、1394.
- [21] 陈尚君辑纂.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：卷一三四[M]. 上海：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05. 4179.
- [25] 欧阳修. 新五代史：卷二二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. 369.
- [28]、[44] 吴任臣. 十国春秋：卷九十四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. 1367、1358.
- [30] 黄滔. 黄御史公集：卷六[M]. 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3. 82.
- [31] 五国故事：卷下[M]. 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3. 216.
- [32]、[45] 吴任臣. 十国春秋：卷九十一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. 1325、1330.
- [33]、[37] 欧阳修. 新五代史：卷六十八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. 848-849、850.
- [34] 吴任臣. 十国春秋：卷九十八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. 1402.
- [36] 司马光. 资治通鉴：卷二八一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6. 8460.
- [40] 司马光. 资治通鉴：卷二八二[M]. 北京：1956. 9226.
- [41] 吴任臣. 十国春秋：卷九十二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. 1341.
- [42]、[43] 司马光. 资治通鉴：卷二八三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6. 9240-9242、9251.
- [46] 梁克家. 三山志：卷七[M]. 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3. 167

(责任编辑：郑 涵)